明周



柏林圍牆倒下三十周年

每一個終結都是新開始

飲飲食食

人口老化下 青森蘋果農自救法

文化設計

La Nouvelle Vague 法國電影新浪潮六十年 仍然青春

MING PAO WEEKLY 明報周刊 2661 | 08·11·2019 | 一書三冊 HKD25

每一個終結都是新開始

柏林圍牆倒下三十周年



2019年11月9日是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周年，今年的德國紀念活動以前東德地區和平革命為主題展開。

我們在前東德城市探尋歷史的蹤迹，尋訪時代舊場景和被淡忘的小人物，圍牆高聳的年代，有人選擇拚死越境、有人選擇走上街頭疾呼，有人選擇留守家園，狹縫中尋求自由……三十年過去了，當日的選擇如何影響今日的生活？

前東德留存下來的，不只是對專制的反抗，還有追求自由的勇氣，追求更好生活的共鳴。柏林牆遺址依然聳立，不斷地提醒人們：極權可以在一段時間阻擋一些人的自由，但是不可能阻擋國民對自由的追求。

訪問、撰文·陳伊敏
攝影·李浩賢
鳴謝· visitBerlin

JEDES ENDE IST EIN NEUER ANFANG

1989年11月11日，為了在西柏林享受觀光和購物的樂趣，成千上萬的東柏林人聚集在Eberswalder大街上由軍隊推土機開設的新開口處。（圖片：法新社）

那年那月那日
那牆那城和那些人



1973年東柏林建築工人在勃蘭登堡門（德語：Brandenburger Tor）附近加固柏林圍牆。（圖片：法新社）





（左）1961年8月16日，在柏林牆修建之前，一名西柏林婦女越過鐵絲網，向東柏林人贈送了一些東西。（圖片：法新社）

（右）1961年8月13日，東德難民在Marienfeld難民接待中心等待食物分發，他們因為柏林圍牆的修建而逃離東柏林。（圖片：法新社）



1961年8月15日，東德工人建立一段柏林牆，人們從西柏林圍觀。（圖片：法新社）

二戰結束後，德國被美、英、法及蘇聯佔領，1949分別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至1961年，不滿極權政府而遷移至西德的東德人已達三百萬。為了阻止逃亡潮，1961年8月13日，東德政府砌起柏林圍牆，日益加固由混凝土牆、瞭望塔、自動射擊區、無人地帶構成的邊防設施，167.8公里的柏林圍牆是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也是分割東西歐的鐵幕象徵。



1961年8月11日，德國家庭在東柏林被東德政府新建的圍牆一分為二之前逃離家園。（圖片：法新社）

1989年東德人的勇氣



1989年11月4日，人羣集中在東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展開爭取改革的和平遊行，是東德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圖片：法新社）

回顧柏林圍牆倒塌，要從和平革命談起。

1989年，東德的民間調研表明三分之一的東德人希望離開這個國家。夏天，位於蘇聯鐵幕之下的匈牙利拆除與奧地利邊界之間的鐵絲網，數萬東德人由匈牙利前往自由西歐。

1989年的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建國四十周年，儘管人民大量出走，儘管各地街頭抗議活動愈演愈烈，統一社會黨（SED）仍然舉行盛大慶典。東德各大城市如東柏林、萊比錫、德累斯頓、波茨坦、馬格德堡等地爆發不同規模的抗議示威，人民走上街頭發出變革的呼聲，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當晚，數千名東柏林市民在Alexanderplatz（亞歷山大廣場）和政府的宴會場地共和國宮（Palast der Republik）聚集抗議，後來遭警察驅散和追捕，數百人被捕。

德國自由薩克森州西南部中世紀城市普勞恩（Plauen）卻出現了不一樣的故事。數天前，廿二歲的工具製造匠Jörg Schneider匿名起草《社會民主轉型倡議》，夜裏悄悄塞入數百居民的信箱。他呼籲市民10月7日下午3點在劇院廣場示威抗議——訴求集會、示威和罷工權，言論、新聞、旅行和民主選舉自由……

此前，東德各地的示威活動都以暴力驅逐逮捕收場。許多人憂心忡忡會重演中國的天安門鎮壓。沒有人知道SED領導人是否會使用武力驅離和平示威的民眾，局勢可謂劍拔弩張。

那是一個星期六，毛毛雨讓天空格外沉鬱。然而，愈來愈多的人克服恐懼冒雨聚集到市中心，3點鐘，這個只有七萬人的小城卻有一萬五千人出來遊行……遊行隊伍向市政廳邁進，教會牧師Thomas Küttler走在隊伍前頭。

直升機在人羣上空不斷盤旋，警察用水炮射向示威者。但這沒能驅散人羣。最後，水炮竟然失靈壞了！「最重要的是不要暴力！不要暴力！」Küttler一遍又一遍地向市政廳和示威者雙方提醒。後來，直升機戲劇般突然轉頭駕走了。市政廳傳來消息說，下周將會和市民對話。



1989年10月7日在Plauen的示威遊行，一萬五千人參加要求政府改革。（圖片：R. Fröhlich）

示威者很快和平散去，告別前默契地喊：「我們會回來的！」

午夜，當國家人民軍的軍隊來到了Plauen，發現已經沒有必要採取行動——一切都恢復了正常。

10月9日的萊比錫，「星期一示威」規模空前，七萬人走上街頭遊行，高喊着「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攝影師Siegbert Schefke千方百計將拍下的片段送到西德，和平大遊行的鏡頭傳遍了全世界，亦載入史冊。

1989年11月4日，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周圍的街道上，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變革而遊行，在共和國宮（德語：Palast der Republik）橫幅上寫着：「一次說謊，永遠說謊……」和「民主」。（圖片：法新社）





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市民向邊防軍遞上一壺咖啡。（圖片：法新社）



1989年11月9日，東柏林市民在查理檢查站乘車進入西柏林時受到人羣的歡迎。（圖片：法新社）

11月4日，東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有五十至一百萬人參與其中，是東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

五天後，柏林圍牆轟然倒下，隨之一同倒下的還會有東德政權。次年，分裂了四十年的東西兩德重新統一。

為什麼是一場和平革命？

據說，10月8日至11月9日，部隊處於警戒狀態：他們穿著制服睡覺，軍械庫一直都有人待命，每個士兵都帶着彈藥和炸藥。為什麼10月此起彼伏的街頭抗爭演變為和平革命呢？為什麼幾十萬駐東的蘇軍沒有鎮壓示威者呢？

德國歷史學家Gerd Naumann說，以Plauen為例，當時官方領導人無視民意，誤判了情況，他們假定可能只有數百上千人的反對勢力，沒想到來了十倍的人，示威者超出預期的數量讓普通警察難以招架。而許多防暴警察是強制被徵入伍。他們對社會很灰心，忠誠度也降低了。因此，也不想與自己的人民作鬥爭。當日下午，市政府相關高管參加柏林國慶慶典，指揮鍵顯然被打破了。東柏林曾下令「鎮壓」，但是該命令被認為無法執行——示威者十分和平，就連之前的普通市民也轉為了示威者。

「不要低估物質匱乏的困擾，買不到水果和咖啡，講電話的時候竊聽的干擾聲音，旅行只能去莫斯科而不可以去巴黎，在苦澀當中，人們的都渴望過更有尊嚴的生活。」香港歌德學院院長Dr. Almuth Meyer-Zollitsch說。前東德人收看到西德的節目，兩邊發展的差距有目共睹，他們知道什麼是謊言，對政府更加失望，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紐帶減弱了。當時東德經濟已幾近崩潰，計劃經濟體制低效率、環境污染嚴重，意識形態的控制加強，危機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

「德國人非常感激戈爾巴喬夫。當時他決心推行改革，讓社會主義陣營獲得更多民主自由，他知道獨裁和站在人們的對立面將無法得到民心。」她說，不像1950、1960年代，蘇聯坦克鎮壓了人民和平抗議活動，1989和平革命的另一個關鍵是蘇聯政府未有干預東德的內政。戈爾巴喬夫還敦促東德領袖昂納克盡早改革，他在那時說了一句名言：「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的人」！此外，當時正值東德四十周年國慶，領導人也不希望流血事件影響了「盛事」的氣氛。

教堂在東德是公民社會的搖籃，也是抗爭與革命活動的據點，市民在教堂獲得一絲自由的喘息，暫時遠離國家安全部（通稱「史塔西」）的窺探。例如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斯教堂的星期一祈禱會演變成著名的大型星期一和平示威。「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記者衝破東德輿論封鎖，媒體報道讓革命浪潮得到世界的輿論關注，也確保了非暴力。」她說。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後的「啄木鳥」（圖片：Justin Leighton/Alamy Stock Photo）



1990年一百多位藝術家在1.3公里的柏林圍牆作畫，主題是自由、團結、平等與和平。

每一幅畫都在提醒着什麼是自由

儘管11月9日晚柏林圍牆完全開放，但並沒有被立即拆除。從那天起，大批人帶着鐵錘和鑿子象徵性地想毀壞掉這一座阻擋他們自由多年的圍牆，並將牆體留作紀念品。這些人被稱作「圍牆啄木鳥」（Mauerspechte）。1990年6月東德軍隊正式下令拆除柏林圍牆。

位於柏林東火車站附近的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是現存的柏林牆中最長的一段。1990年初，來自二十一個國家的一百一十八位藝術家在這段1.3公里的柏林牆上作畫，塗上繽紛的色彩，露天的藝術畫廊由此誕生。

當年畫到800米的時候，政府準備拆牆，藝術家們火速集合，要趕着完成畫畫，並將最後500米也保留下來。

每一幅畫都有一個生動的故事。

1990年是西德藝術家Peter Lorenz第一次踏足東德。他畫的有蘇聯、美國、東德、西德的國旗，「當時充滿了希望，我只是將心中的感受畫出。

從未失去自由，就不知道自由的寶貴。年紀大了愈來愈覺得感激，感激我們擁有的自由。你知道了什麼是自由，不要忘記其寶貴。」

東德國產汽車Trabant破牆衝出，是圍牆上的一幅經典之作。Trabant有個暱稱叫"Trabi"，當年東德人想買Trabi，從訂購到取車要等十二至十五年。在鋼鐵材料匱乏的東德，車廠以合成樹脂、棉花纖維、前蘇聯的破布等「回收材料」合成熱固性塑膠來打造車身，開動時轟隆隆巨響，噴出陣陣煙，被戲稱為「移動紙箱」、「塑膠轟炸機」。

東德藝術家Birgit Kinder當年想畫一輛車衝破圍牆，另外一位藝術家說要等待安排作畫的位置，「過去我等了十多年才等到車，現在我不想再等了。」説罷就在空位上畫起來。原來1990年，三十歲的她終於才拿到十八歲預訂的車。

伊朗裔的德國籍藝術家Kani Alavi作為策劃人，當年創作了一幅《十一月的日子》。靈感來自他在查理檢查站附近的公寓裏所觀察，描繪了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天成千上萬的東德人湧向西方，蜂擁的人羣展露着情緒不一的各種面孔——喜悅、恐懼、困惑、釋放。

長時間日曬雨淋，牆上的畫作有的顏色剝落，有的被新的塗鴉覆蓋，現在看到的畫是2009年為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周年而翻新的。東邊畫廊市場推廣負責人Jörg Weber參與籌劃畫作的修繕和翻新。他說，大部分藝術家都回來重畫了，當時籌備了九個月，用了五個月完成了翻新。「不過五幅空白了，因為作畫的藝術家開口索取更高的費用，我們支付不起。」

希望完整保留1990年代的記憶，當年主題是自由、團結、平等與和平，翻新規定要還原當年的畫作。Jörg weber曾是前東德軍隊的軍官，他內心厭惡政治，有家庭而不敢違抗組織。充滿壓抑感，無法做真的自己，國家也充滿了謊言，後來，他「裝傻」：「我的知識不夠了，我做不來。」很快他因能力不足而被辭退。八十年代成為自由藝術家、網站設計師。

「不要被物質慾望帶走了自己的內心，社會充滿了對立，冷戰結束，敵人走了，又有新的敵人——人人都堅持我的想法才是對的，想法不一樣，就是敵人。什麼是自由？言論的自由、心靈的自由，呼吸的自由。」他提醒。

前東德具有蘇聯——東歐陣營政治體制的普遍特徵：計劃經濟、無選舉自由、無新聞自由，無出境和遷徙自由，政府對異議分子禁錮或驅逐出境。

1989年，圍牆存在的廿八年間，有一百二十五萬人離開了東德奔赴自由的西方。最集中在柏林圍牆修建和倒塌那兩年——1961年有大約廿三萬，1989年有三十九萬。據史塔西統計，1976至1988年間，在邊境有三萬八千次失敗的逃亡，即每年超過三千次。

從圍牆高築的那刻起，東德人從來沒有放棄越境的努力，以攀爬、跳樓、熱氣球、挖地道等方式逃走。逃亡者面對的不僅是堅固的高牆，還有邊防軍的射擊，根據柏林圍牆紀念館資料，在柏林圍牆上被殺的死難者至少一百四十人。

前東德年輕人的亡命之旅



Peter Barsch1978年從施普雷河（德語：Spree）游泳逃到西柏林。



六十三歲的Peter Barsch目前在柏林當導遊

牆下的出路

施普雷河（Spree River）貫穿柏林，風光綺麗。陽光下，人們遊船賞景，慢遊柏林。六十三歲的導遊Peter Barsch站在Schilling橋上，望着緩緩駛過橋底的遊船，慢慢講述他逃出東德的故事。1978年9月3日，廿二歲的Barsch冒死從這座橋下游水逃到了西德，一起行動的還有一位孕婦。

「被困在這個國家，就像一個囚犯。一舉一動要被控制着。我討厭被限制出行，難道要等到六十五歲才有資格去巴黎嗎？我看不到未來，感覺不到快樂。」實際上，Barsch有三次逃亡經驗。

1956年出生的Barsch小時候住在東柏林Treptow區，地處東西柏林交界。童年時他和一羣孩子常常鑽過鐵絲網，到一街之隔的西德買朱古力吃。持槍的士兵就在身邊巡邏，沒當這些孩子一回事。

1961年Barsch五歲那年，一家人不得不搬家——鐵絲網變成鋼筋水泥牆，周遭的房子全部拆掉，空地用來做內牆與外牆之間的「無人地帶」。

青少年時代的Barsch特立獨行，留着長髮，自嘲「幼稚又自大」。1969年，亞歷山大廣場的世界時鐘（Weltzeituhr）落成。當老師眉飛色舞地向他們介紹這新建築多麼現代化，Barsch卻給她澆冷水：「我們不能自由去日本東京，為什麼要知道那裏的時間呢！」

後來，父母離婚，他與父親關係緊張，終日惹麻煩，被視為「問題少年」。十六歲，被送入少年管教所。「也許西部更好？」他突然萌生離開東德的念頭。

於是，第一次逃亡開始了，不，其實只是和朋友搭火車去東西邊界一探地勢。他們不慎踏入敏感地帶——非西德人不能進入的區域。因私自跨越邊界並試圖叛逃，他坐了兩年多監。

出獄後，他當了金屬加工廠工人，做演員拍電影、在藝術學院做繪畫裸體模特兒。600-700馬克是平均人工，他能夠賺到1400馬克，日子過得不錯。但有次不小心又走入禁區，被警察拘捕盤問。

柏林被認為難度最高、幾乎不可能逃走的地方。「在這個最熟悉的地方，我總是感覺有一個方式逃離這個國家。」他說。

「許多人也想逃離，但是有許多牽絆，家庭、孩子，我一無所有，孑然一身。我特意不去愛上任何人，也不投入感情，其實我相當冷漠。」他總是獨自研究地圖，夢想着找到逃出去的路。

第二次逃亡，Barsch看中了位處邊界的Charité醫院。那裏沒有鐵網，內牆邊有一道鐵門，「無人地帶」只有5米。兩道圍牆中間只有一個監視塔。「如果我是邊防守衛，守在那個眺望塔，我會無時無刻盯着嗎？十分鐘？十天？十年？如果一直無事發生，我會做什麼？也許抽煙，也許發呆，打瞌睡？只要我可以不出聲地跳下牆，應該不會被發現……」他對此深信不疑。

他不斷練習翻牆、攀爬障礙物，練習落地不發出聲音。1978年夏天，他和新拍檔行動了，很輕巧地翻過鐵門，落地無聲。

但拍檔卻踢到鐵門發出了巨響。

這下驚動了守衛打開了窗戶張望——幸好他們躲在眺望塔之下。已經引起警惕，只好撤退。他心情興奮又害怕。「我可不想再入大牢了，那裏已沒什麼新鮮感。」後來，他從灌木叢溜走，二人逃過一劫，但他直覺下次要再換拍檔了。

一個月後，二十歲的好友Ute Bischoff告訴他已懷孕，男友在西邊，勢必想辦法逃過去。「她是游泳健將，有決心，而且不是秘密警察……」Barsch思索幾天，決定試試這位新的拍檔。

他向Bischoff分享了獨到的路線。他就讀的學校就在施普雷河邊，可以望見邊界和河上的一切，「我們一直想着牆上逃走，為何不從牆底試試？有一個橋洞總是開着，專門給貨船和巡邏船經過，那是我們的機會……」早前，他已經暗自訓練「靜音」游泳——不用手划水，不濺起水花。

終於等到了一個下雨天，淅淅瀝瀝的小雨將河面大地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深夜，他們穿著黑色T-shirt，帶着潛水面鏡、蛙鞋和呼吸管，來到Jannowitz橋下的岸邊。Bischoff果斷先下水，她游到前面，時不時停下來等Barsch，看他的指揮。

施普雷河貫穿柏林，觀光船載着人們漫遊欣賞兩岸風光。







（左）在萊爾特車站和腓特烈大街之間，邊防設施沿着施普雷河岸而建。在往東的鐵路線上，一列蒸汽客運列車正在行駛。背景是建於1980年Charité新大樓。©Berlin Wall Foundation, photo: Hans-Joachim Grimm

（右）1975年，冷戰時期柏林圍牆的瞭望塔。（圖片：法新社）

游了一陣，她太冷了，冷到發抖，牙齒一直打顫，幸好附近工廠排出的廢水是發熱的。他們沿着河岸向Schilling游去，橋上的監視塔荷槍實彈的士兵嚴密守衛着。他們準備橫渡到對面準備鑽進橋洞。

此時，一艘巡邏艇開過來了，並停了下來。Bischoff像一條魚沉了下水，Barsch安靜地漂浮在水上，一動不動。

不知過了多久，巡邏艇發動了引擎，漸漸駛走。二人組繼續往前游。Bischoff看到一個梯子，正向往上爬，但是Barsch直覺不該從這裏上去，「離檢測塔太近！」他們決定往前游一陣，岸邊有個小港口，停着一隻貨船，那是最好的掩護。

當Barsch爬上岸。Bischoff在水中一動不動，一再遲疑不肯上岸。就在千鈞一髮的時候，Barsch說：「你如果不上來，我就跳下去。我們會被射死或者一起入獄。」

瞭望塔就在兩百米處，邊防軍隨時可能發現他們。「我害怕極了，完全不敢看那邊。」

她終於伸出手，讓Barsch將她從水中拉上岸。

上岸後見到停車場有六個貨櫃車，裝滿了朱古力。「我們脫險了！」他說。

「原來這麼容易就逃到了西柏林！」她說。他聽後倒吸一口氣。

回顧逃亡的過程，Barsch說，對這裏的一切瞭如指掌，從學校的窗口長期觀察着，包括岸邊小港口的船，哪一個橋洞開着……「也許他們在抽煙，也許看到了我們，我不知道。我設身處地，如果我是那個士兵，正常人不會一直盯着河邊。這是人性。」

拿到西德身份後，他們拒絕接受媒體訪問。一來不想曝光了逃走路線，日後會斷了別人的後路；二來不想當日把守邊防的守衛被懲罰。

到了西德的生活，起初每日都很激動人心，他做酒吧侍應和調酒師。一年後，看着圍牆，開始有點思鄉，那已經回不去了，和那邊的人生完全斷隔了。「那種感覺有點受不了。我的根還在東德，在西德沒什麼歸屬感。反正都是異鄉，為什麼不去遠點？」後來，他去了巴黎遇到了一位美國女子，之後更成為他的太太，於是去了美國生活。此後，他申請回東德探親一直被拒絕。

1989年，當他在美國讀到報紙圍牆倒了，邊界開放了，從不流淚的他，淚流滿面。

1980年，從東柏林逃到西柏林兩年後，Peter Barsch終於踏足法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投奔自由 絕不回頭



冷戰時期布蘭登堡門位於東柏林和西柏林的分界線上， Peter Keup走過這道門象徵走向自由。

在臨近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的露天咖啡座見面，聊了沒多久，Peter Keup顯得有點不自在。

「每次來東柏林，我都感覺很不舒服。你看路上這些行人，有時候我還想他們當中，是不是有秘密警察？我盡量避免來東邊。」離開東德三十七年，這位六十一歲的前東德舞蹈員仍有這種揮之不去的陰影。

Keup1958年出生於德累斯頓附近的Radebeul。父母原本來自西德，在他出生前兩年，父親以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身份自願搬到東德。

「母親過得很不快樂，小時候常見到她哭，尤其是祖父母來看望完我們道別回去西德的時候。」身邊的大人告訴他，來自西邊的人是敵人。他十分困惑：「西邊有我的祖父母，為什麼不可以去探望祖父母？」

童年時每次外公外婆來探他們，Keup總是高興地手舞足蹈。「每次他們一打開行李箱，頓時飄出來自西德的味道，那些肥皂、朱古力、咖啡的香氣真好聞。」

Keup十六歲的時候就讀一所精英學校，1974年，父母申請了出境許可。不准他參加田徑比賽的體育俱樂部。「想離開的人都被視為對社會主義不忠誠」，他說，學校甚至勸他放棄自己的父母——寄居到寄養家庭那兒。不久，他被迫退學。

四處找不到工作，在印刷廠做排字工人學徒。但因跳舞出色，在全國錦標賽獲獎，當上了舞蹈員，被選入國家舞蹈隊。從此，史塔西開始監視他，任何前往西方參加錦標賽的旅行都被禁止。

1999年，Peter Keup查閱自己的史塔希檔案，照片是他入獄時。



1981年夏天， 他第一次萌生逃離東德的念頭。他與母親透露了他的計劃，將80馬克縫到褲縫裏便胸有成竹地出發了。

他計劃經捷克斯洛伐克逃到匈牙利，然後再逃到奧地利。在捷克邊境，他被持槍的士兵截住，要查看他的回程火車票。此前去過捷克多次，那是他唯一一次沒有買回程票。被搜出身上有指南針，他被捕了。

在審訊室。他被強光照着，「我只看到影子，看不見任何人的臉。」

「你想離開共和國嗎？」

「不想！」

「你想離開共和國嗎？」

「沒有。」

連續三十九個小時，他被幾個人輪流盤問。

「他們不斷開燈、關燈，令人無法忍受！」最後他承認了。

作為政治犯，他被單獨囚禁，每天有半小時放風，總算吸到一點新鮮的空氣，「我只能不停地繞圈跑步。我每天都在等待，靠回憶想像有人和自己在一起。他在德累斯頓的史塔西監獄被關押了四個月，以「準備逃離共和國」的罪名被判處十個月的監禁。

1982年初，Keup被帶出了牢房，獄警要求他簽署文件，擺在眼前有兩個選擇：請求社會原諒接納。但是他拒絕簽署，因此，另外一個選擇是簽署放棄東德公民身份的聲明書。

他毫不猶豫地簽了。「從此，我就像一塊肉，無國籍，無身份了。」那刻他有點茫然。

隨後，Keup和其他的囚犯一起被送上了一輛巴士。

車上有一個男人對他們說：「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律師。現在，這趟巴士將開往西德，請你們保持安靜……」

Keup他們在一個營地住了四天，辦理了手續，有人對他說：「你是我們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國民了。你想去哪裏？」

「我自由了嗎？我想去Essen找我的祖父。」Keup以為自己在做夢：「此刻好像到了天堂，結局比我所能想像的更好！」

有史學家說，當時東德政府為解救國庫空虛，將一些政治囚犯賣給西德換取數十億西德馬克……東德需要西方的貨幣，對西德來說，那是人道行動，營救在東德監獄受苦的政治犯。 每個人大概10萬到20萬馬克。

1989年11月9日，當電視新聞傳來東西邊界打開，柏林牆被撬開的消息傳來。三十一歲的Keup 震驚不已。「什麼？我們要和史塔西分享國家嗎？又要再和這些秘密警察一起生活嗎？永遠都不想再過前東德的生活了！」他有着焦慮感，立即關了電視。

直至今日，Keup依然十分感激自己擁有的生活，慶幸自己有了不一樣的人生。自1982年，Keup就在Essen定居，還開了自己的舞蹈學校。後來不斷進修又攻讀大學、博士學位。好像要追回那些無法讀書、無法尋夢的青葱歲月。

如今，他既是歷史見證人，也是研究者，四處講學，審視這段特殊的歷史，他說，「從我的角度和經驗來看，人們會試圖跨越任何類型的邊界，即使它被建得像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

柏林圍牆紀念館戶外紀念區，悼念着柏林圍牆存在時遭槍殺的死難者。



今日的柏林東邊承載着歷史帶着叛逆性和創造性



Clärchens Ballhaus是柏林現存最老的舞廳，冷戰的鐵幕下常為東柏林與西柏林人的約會地點。如今仍開辦各種不同的社交舞活動，晚上在餐廳會有Salsa、Tango、Swing主題舞蹈時間，年輕人在百年不變的舞廳內旋轉起舞。



Holzmarkt有一個全世界最小的Disco，如電話亭一樣大。

柏林歡迎卡（Berlin WelcomeCard）公共交通通票，在指定區域內可免費無限次搭乘地鐵、快鐵、公車等大眾交通，在柏林200多個景點與文化和娛樂場所享有優惠，隨附一本柏林旅遊指南，提供各種參觀景點的建議、主題遊覽線路和提示。

遊覽柏林實用App：Going Local Berlin和ABOUT BERLIN





Holzmarkt是施普雷河邊的一個「城市烏托邦」，市民拒絕了河岸由房地產開發商建蓋高樓，組成了社會性的合作社。這裏有藝術工作室、咖啡店、餐廳，甚至託兒所，二手磚和廢木料製成的休憩空間和富有創意和色彩的裝飾。吃個披薩，喝杯啤酒，數數路過的船隻，在著名的夜總會俱樂部Kater Blau盡情跳舞。

柏林被譽為歐洲最綠色環保的城市之一。弗里德里希人民公園（Volkspark Friedrichshain）是柏林最古老的公園。柏林人喜歡在公園野餐、散步、放風箏，從城市的喧囂中放鬆。



位於Kollwitzstraße的「漂書樹」——自助公共書架，是柏林圖書森林的一站。讀者放下一本書送給「書林」，作為交換他可以借走一本新書。每棵樹幹都經過專業加工，挖空，配有書架，再圍成一個圈成為一棵樹。



限制中找到自由的縫隙

普通東德人曾經以為柏林圍牆將是他們生命中的永久建物，生活的閉鎖和處處受限中，他們從未想過離開，但他們深深渴望一個更好的國家。直到圍牆倒下，冷戰終結，他們終於見證了自由的開端。



柏林的卡爾．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東德最著名的街道，大道兩旁的樓房修建於1950年代，高大整齊的方形建築帶有典型的社會主義風格。當時整條大街被作為東德戰後重建的樣板工程，時至今日，馬大道兩旁的公寓相當搶手，帶着濃重的社會主義時期的色彩。

名字背後的自由



東德的託兒服務和幼稚園讓女性可以投入工作，至今仍為Veronika Sisolefsky 津津樂道。Joyce為前排右三。

Veronika Sisolefsky1951年出生，十歲的時候圍牆建起來了；她的女兒Joyce Olivia Bernitt1979年出生，十歲的時候圍牆倒了，二代人都經歷了歷史的巨變。

柏林牆開放之後，成千上萬的東德人湧向西德，希望親身看看被隔絕了幾十年的傳說中的西柏林。庫達姆大街是原西柏林最重要的購物街。這條象徵着西方世界的自由與繁榮的街上便擁滿了來自東柏林的Trabi車。

西德政府向東德居民發放100馬克的「歡迎金」，作為十歲孩子的Joyce只有50馬克。父母買了一些水果、朱古力、糖果和咖啡，然後將錢花在Joyce身上：買給她一個穿著粉紅色舞會禮服的Barbie Doll，還有Walkman和Michael Jackson錄音帶，以及一個小加菲貓公仔。Joyce從小渴望得到一個Barbie Doll，但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品，東德當然不會買得到。大人曾給她自產公仔，她並不喜歡——那個娃娃是個孩子人形，並非像Barbie Doll一樣都是個大人。

Veronika一家曾經住在卡爾．馬克思大街（德語：Karl-Marx-Allee）大道，當時很令人自豪。社會主義風格的高大方形建築修建於1950年代，當時整條大街被作為東德戰後重建的「樣板」。她在郵局工作，丈夫是劇院的工程師，日子過得不錯。不過，他們訂購的Trabi車，足足等了十六年。

「我覺得前東德的生活容易許多，工作一切都是分配的。我的公司建造這些房屋，還建造了柏林電視台！」Veronika兒子Kay說，二十歲出頭時原本在當建築工，1996隨着公司破產，他和一萬多員工一起失業。毫無面試經驗的他失業了一年，最後找了份當郵差的工作。

兩德統一後，東德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大量倒閉。多年來習慣了「鐵飯碗」「大鍋飯」的東德人，無法一下適應市場經濟下的競爭。

記者所遇前東德長大的一代人，他們有時候會懷念前東德時代表面上人人平等的平穩日子：東德政府為普通民眾提供廉價住房，教育、醫療等一律免費，當然僅停留在最基礎的水準。當時鼓勵全民就業，鼓勵婦女投身到工作，幼稚園、託兒體系和兒童康樂活動都是福利之一。Joyce十五個星期大就被送去了幼稚園。

但是沒有人願意回到過去——各種監視、控制，計劃經濟令國民經濟一蹶不振、物質奇缺、基本建設不足……

Joyce Olivia Bernitt雪櫃上的生活照和世界各地旅行收集的印，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媽媽的1989年以前的年代無法想像。



Veronika認為，最可怕是無人可以避開史塔西的窺視——東德臭名昭著的間諜機構，運行着五十多萬名線人，收集了大量關於公民的數據。在東德短暫的四十年歷史中，前後一共有數十萬名公民成了史塔西非正式的通報合作者，即告密者。史塔西的標語是「我們無所不在」（Wir sind überall.），至1989年為止，東德約有六百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已超過東德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為了徹底掌控人民的念頭和想法，那些正式與非正式的工作人員，把許多東德人民的資料彙編成檔案。

1974年，Veronika因與親戚關係不佳而被舉報。那一年，她失去了工作，被迫使用特殊身份證，整整一年被限制出行，連東歐共產國家都不准去了。

取名字也不是自由的。Joyce便是不尋常的名字。1970年代和1980年代，東德父母為孩子起美國或法國名字十分流行。既然不能自由旅行，他們抓住使用外國名字的自由。

Veronika想給女兒取一個愛爾蘭小說家Joyce Cary，但為了得到當局許可，不得不到圖書團填一張表格，以證明Joyce這個名字確實存在。

她家的傳統是給女兒取外婆的名字作為中間名，但因她和母親的關系並不好，所以她想給Joyce奶奶的名字。實際上，Joyce的親生父親來自非洲安哥拉，所以她得到一個安哥拉名字。但由於Veronika無法證明那個安哥拉名字確實存在，所以無法用來作為中間名。最後她選了自己最喜歡的名字Olivia，因此女兒叫Joyce Olivia.

「我在東德的童年過得非常好，我很感恩那時年紀尚小。後來圍牆不存在了，成長一路上都感覺我就是柏林人，已經沒有太多東與西的差異感。」在統一後的德國長大，Joyce喜歡冒險，喜歡新鮮事物，她選擇了在旅遊業工作。「旅遊教人長見識。」



Kay Bernitt、Joyce Olivia Bernitt和Veronika Sisolefsky家庭合照，他們一直住在東柏林。

圍牆限制我的生活但是無法限制我的想像

傳譯工作讓Cornelia Günther在東德的封閉中依然有拓寬國際視野的機會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位於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1989年以前，任職傳譯的Cornelia Günther就在附近的「Mauer街」工作，辦公大樓正對着西柏林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她曾在心中想過無數次，如果可以走過那100米的邊界地帶，到對面街Cafe Adler喝杯咖啡，該多好！同事笑她是異想天開。

小時候看德國兒童寢前定格動畫電視節目《我們的小沙人》（德語：Unser Sandmännchen）主角多麼自由可以去全世界旅行，甚至登上月球。Günther有一個心願：希望有一天可以去英語國家旅行。

她自小對英語和俄語學習很感興趣。但是在東德，一切都是規劃的。在考大學的時候，校長告訴她和另外一個同學，二者只有一人可以申請大學學位日後擔任翻譯和口譯員。然而，事後兩位堅定的年輕人卻決意申請了學校，結果Günther被柏林的洪堡大學錄取，同學則去讀萊比錫大學。

上得了大學，但是Günther卻無法選取她喜歡的英語專業，根據配額，她必須讀波蘭語和俄語。她悶悶不樂地度過了數月大學生活，後來碰巧有英語系的同學想學波蘭語，二人互換了學科，皆大歡喜。因為完全沒有西德的親戚，這反而成為了優勢。「沒有離開的理由。」她說。

圍牆橫貫全城將柏林一分為二 ，連車站都一分為二。柏林腓特烈大街車站位處牆東側，作為邊境口岸，是東、西列車的終端站，兩者的列車不再能相互對開到彼此的軌道上，而得分別停靠在站內的不同區域。 月台之間豎立起一道3米高的鋼鐵牆，兩邊的乘客雖然看不到彼此，但能聽到另一個站區內的聲音。1980年代，東德又加裝了隔音牆防止聲音傳遞。Günther上大學時每日搭火車去腓特烈大街，見到鳥兒在鋼鐵牆頂端的空隙自由飛來飛去，十分羨慕。然而，她從未想過要離開東德，只是希望有一個更好更自由的社會。

對她而言，翻譯的工作是她接觸世界的窗口，1970、1980年代，她為不少到東德演出的西方歌星做翻譯，例如Joe Cocker、Bruce Springsteen、Depeche Mode。

「限制中總是可以找到方法。」Günther說，東德人有種逆境求存的本領。「我們知道一切來之不易，對於目前所擁有的一切，不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11月9日夜晚，她在電視上觀看了邊境圍牆的開放。就像那天晚上的許多人一樣，她不知所措，流着淚。那晚許多人步行或開車穿過Bornholmer大街的第一個開放的過境點，但是有一個場景她仍然記憶猶新：一名老婦站在東柏林最著名的地標側，即東西德邊境處的布蘭登堡門。由於不是官方的過境點，那天晚上還沒有開放。這位婆婆哭着要求邊防士兵允許她走過布蘭登堡門，看一眼西柏林，然後再回來。她的眼淚最終使守衛感動了，他握住她的手，陪她穿過大門，然後往回走。周圍的人開始親吻邊防軍並給他們帶來了鮮花。他們似乎不再是阻止同胞前往西方的敵人。

只是想到牆後面的世界看一眼，這是許多東德人的心願。而當日堅持理想的Günther，如今足迹遍及全球。

1988年英國樂隊Depeche Mode新聞發布會現場，Cornelia Günther當傳譯。（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oland Verwiebe（左）和Sascha Grohmann（右）在人民劇院前

永遠的抗爭者



樂隊今年10月到美國參加Honk藝術節（圖片：Sascha Grohmann）

樂隊Bolschewistische Kurkapelle Schwarz-Rot1986年在東柏林成立的反主流文化和反極權的地下樂隊，他們關注勞工、草根生活，將傳統的銅管樂與民樂、搖滾和朋克共冶一爐。

「東德生活不富裕，但是學音樂甚至樂器是免費的，作為孩子來說，我們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暑假可以參與大量的文化活動。」單簧管樂師Roland Verwiebe 1988年十七歲的時候加入了這個樂隊。

當他們日漸長大，卻愈來愈不滿這個國家意識形態控制。有次在廣場演出，二分鐘就有秘密警察來阻止和驅趕。因為有朋友在政府工作，得到了特殊庇護，沒有太多麻煩。他們只能在教堂、私人畫廊、私人聚會表演。

樂隊向那些1930年反納粹、反法西斯被迫流亡的猶太藝術家致敬，至今仍演繹他們的作品。例如奧地利作曲家Hanns Eisler（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歌《從廢墟中崛起》的作曲者，曾兩度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還有德國詩人、劇作家Bertolt Brecht的作品。

當年波蘭狀況的和平革命，樂隊成員沒有缺席。他們是走上街頭的和平示威者。

11月4日，亞歷山大廣場爆發了東德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要求爭取自由選舉，媒體開放，出行自由和言論自由。樂隊現場演奏支持抗爭運動。

「當時人們情緒激動，但是充滿了希望和鬥志，現場未見到一個警察。」Verwiebe回憶，當日演奏了四個小時，一次又一次地奏響當時知道的所有歌曲。例如《Yellow Submarine》(The Beatles)，因為有時住在GDR中就像住在水底的潛水艇一樣封閉；還有Hanns Eisler的反戰和讚揚工人階級的曲子……

樂隊鼓手Sascha Grohmann當年也出現在遊行現場，當時他還不是樂隊成員，卻聽到了他們的演奏。之前一個月，他亦不斷出現在遊行隊伍中。

十七歲的他從西柏林電台聽到消息，10月7日在亞歷山大廣場有一場的示威。「你可以感覺到一種末日感，覺得國家已經到了盡頭。人民已經長大成人，有些東西必須改變。我們想要表現出我們有許多不滿。必須開始走上街頭大聲疾呼，爭取自己的權利。」

當天，示威者想要去權力象徵——共和宮，因為戈爾巴喬夫在那裏。「那時，戈爾巴喬夫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他在蘇聯推行了改革，反對舊的權力鬥爭。他是GDR的『大哥』。沒有莫斯科的同意，GDR無法做出重大決定。因此，人們希望他能影響GDR政府，使其做出改變。」

政府出動了大量警察和安全部隊驅散羣眾。到處都是保安和秘密警察，他們守在住宅入口、公共交通，逮捕了許多人。「我很幸運，毫髮無損地回到家。但是充滿了恐懼。」由於來自公眾和世界上輿論壓力都太大了。幾天後，警察不得不釋放被捕者。

今時今日，四十八歲的Verwiebe是位社會學家、大學教授，四十七歲的Grohmann 是人民劇院現任燈光師。他們都感恩自己的幸運，他們處於可以改變的年齡。圍牆倒塌後，一切都是新的，社會上有更多的人性，他們在自由中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自己。

在原東德地區的全部五個聯邦州裏，右翼民粹主義的德國另類選擇黨都成為了州議會第二大黨。「相比那些投票給德國選項黨的Ossis，我認為自己與巴塞羅那、紐約或聖彼得堡的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共同點。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柏林人，一個在維也納成功工作了十年的歐洲公民，一個出生在東柏林的德國公民。」Verwiebe說。

這些年，柏林人口膨脹，房屋供不應求，外國投資者將目光投向柏林，使其成為世界上房地產市場增速最高的城市之一。「當前貧富差異比東西差異更大，例如房屋危機，到別人的國家買房子是一個錯誤的邏輯。」Verwiebe道。

三十年過去了，從當初反極權，到今日創作的題材關於地產霸權、貧富差距、環保、難民等議題，始終啟發大眾思考社會議題。除了嚴肅，也是有娛樂的一面，一個樂隊有兩個靈魂。「創造和製作音樂的樂趣，參與的樂趣以及成員之間的友誼。」近二十位成員來自電影、農業、戲劇、建築、政治、工程、教學、醫學等不同領域，一起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依舊每周聚會一次。

30年後，我的生活過得好嗎？



普勞恩（Plauen）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是一個製衣和織布的中心。而蕾絲的發展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Plauen花邊因其圖案的奇妙而獲得了大獎賽的獎項在。GDR時期，居民買不到蕾絲了，因為要作為出口貨換取外幣。兩德統一後，蕾絲工廠私有化，規劃大減，如今的生產也朝低碳環保新材料的方向。家家戶戶的窗戶上都掛有各式精緻的蕾絲，居民戴蕾絲圈巾，甚至衣服也有蕾絲裝點。



萊比錫Spinnerei 原本是歐洲大陸最大的棉花廠，有一百多年歷史。1992年，已廢棄的棉紗廠綜合大樓重新啟用，廠房復興先鋒大多是藝術家，有一百多家工作室，「新萊比錫畫派」代表人物Neo Rauch是最早在Spinnerei建立工作室的人之一。廠區內有畫廊、展覽廳、電影院、咖啡店……已經發展為藝文潮區，吸引了不少音樂家、舞蹈家、手藝人、建築師、設計師開設商店和工作室，成為當地年輕人創業和創意的不錯選擇。

自由也可以被操控



藝術家Sebastian Neeb說，在東德成長的童年讓他練就以不同視角看事物。

「我是柏林人，我已經沒有了東、西的概念。但在東德家庭的養成，讓我學習看到不同的角度。」藝術家Sebastian Neeb說。

柏林擁有四百多家畫廊和二萬多位國際藝術家，堪稱當代藝術領域的中心。在藝廊REITER Berlin prospect遇見Sebastian Neeb的作品展，意味深刻，跨媒介運用各種各樣的技術和材質。那些傳統的肖像畫主角有着人性化的表情，感覺爬出畫布了，再和一些象徵性的物件搭配在一起，例如雕刻的木頭香腸。

畫廊負責人Torsten Reiter介紹，東德時期寫實繪畫和雕塑創作佔主導地位。東德的藝術教育繼承傳統現實主義的工藝和技法，一直延續到2000年代。不少年輕的藝術學生從西方國家來到藝術院校學習。在這方面，邊境的開放也對西方藝術產生了影響。如今東德和西德的藝術已經融合在一起。然而，也有一些像Sebastian Neeb這樣的藝術家正在用當代概念來復甦在東德學院學習的現實主義視覺語言和工藝。

出身和經歷往往塑造一個人的觀點。1980年出生的Neeb 說，在他的童年，有激烈的社會動盪，昔日的真理突然變成謊言，柏林牆倒塌時，他九歲，上三年級。「就在幾周前，老師們還在向少先隊員們宣講社會主義的優點，現在他們卻在大談社會市場經濟的優點。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不容易理解的。還有每晚8點新聞，同一件事，東西兩邊的電視台說的很不一樣，也許這讓我對『真實』概念產生了懷疑。」

他的作品往往具有批判性。近年他的創作主題是「操縱」。「操縱的關係無所不在。例如在老人院活動中，義工給長者頭上戴上頂孩子派對帽子，我們給他娛樂，還是也在擺佈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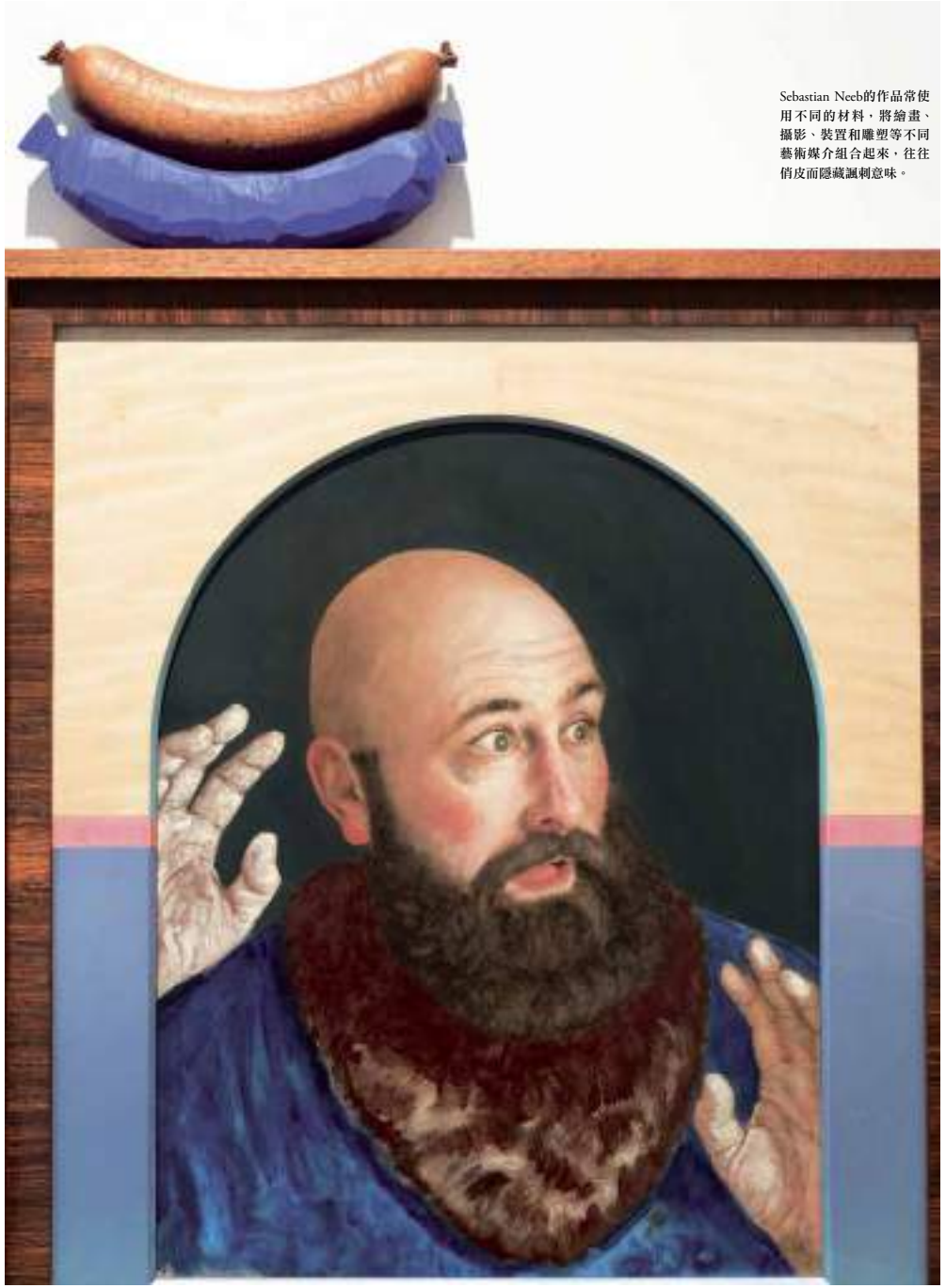
他認為，獎盃、獎牌、證書等物品是很好的操控工具。這背後是為了得獎人，還是為了發獎人？例如，東德給一些家庭門口頒發的是一枚鋁胸章，漆成棕色和金色，如果一個家庭能保持房間乾淨整潔，就能得到它。一個特定的工作或一個成就物質價值通常非常小，發起者決定了你需要採取什麼行動才能得到它。

「我們所處的時代認為不斷的進步和增長將使我們更繁榮，並使我們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新的需求不斷製造能讓我們快樂和滿足的東西。真的這樣嗎？有的操控不易被發現。」他舉例說，我們在社交網絡收集「朋友」、「粉絲」和「讚」。一些從未存在過的東西現在滿足了我們的渴望，我們擁有的「讚」和「追隨者」的數量已經成為一種貨幣，我們做什麼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得到大眾的掌聲。「社交媒體綁定了大量個人時間花費在虛擬空間中，你為他提供了信息，他目標始終是錢。」

在一個不斷被操縱的時代，甚至連自由是一種操縱形式——無論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系統，自由是僅在系統內被允許而已。「我們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被劫持。我們的選擇，並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麼自由。」Neeb有感而發。

Sebastian Neeb作品在畫廊REITER Berlin prospect中展出





Sebastian Neeb的作品常使用不同的材料，將繪畫、攝影、裝置和雕塑等不同藝術媒介組合起來，往往俏皮而隱藏諷刺意味。



德累斯頓文化宮（Kulturpalast）牆上保留1969年繪製的30米馬賽克壁畫，關於工人階級在紅旗下的鬥爭，具有社會主義風格。是否保留這幅畫爭議一時，最後市民決定保留作為東德歷史印記。

拆下心靈的圍牆



Cornelia Reichel希望在德累斯頓建立一個對話平台，促進不同立場的人交流

「易北河上的佛羅倫薩」、「文化的代言詞」、「涅槃重生的東部瑰寶」，作為德國薩克森州首府和第一大城市，德國僅次於首都柏林的第二大城市，德累斯頓有種種美譽。各大宮殿古蹟和巴洛克建築上，四處可見的黑色煙痕，講述戰爭的殘酷和復原的重生精神。

「當人們排着長隊買聖誕節香腸，突然有個人對隊伍的人說『我沒告訴你嗎？他們加了貓肉在裏面！』德累斯頓人Cornelia Reichel示範一個當地風格的冷笑話文化。

離家十年，一直在其他城市工作，主要是德國西部。「德累斯頓不適合當做一個工作的地方，因為這裏一切完美，我不希望被瑣事打擾。」

然而，一年前，她返鄉了。「故鄉需要我，我想要為這裏做點事。」德累斯頓的右翼派別冒起，她感到十分迫切要回來看看情況。

她花一年的時間，重新與社區建立信任。「相信很多人都厭倦了兩極化，渴望對話。例如氣候變化問題，身份問題，什麼是家／家園、故鄉？我們從哪裏來等等。在東德和西德之間，在本地人和移民之間。」

Reichel和夥伴們創辦了一個NGO，專門建立對話的平台。有個活動在電車上和陌生人聊天，她發現許多人都有被聆聽的渴望，而且顯得那麼感激。「這本來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說明問題已經出現了。」

圍牆倒塌的時候，她才十歲。她的媽媽因失業而抑鬱，她能夠理解一代東德人的失落感。「六十歲左右工人階級曾被讚頌為社會的英雄，統一後他們失去了工作，公司倒閉，在市場上沒有了競爭力，日子過得較為艱難，心中有種受害者情緒。

「人們只是互相缺乏理解。」她說，許多人聽不進一些不同的的看法，也不想嘗試去理解，只覺得自己是對的。她希望靠自己的熱情和誠意，讓政見、觀點很不一樣的人出現在一起交流，雖然不認同對方，但是可以對話。「當你將不同看法的人放在對立面，這時你不再視對方為一個人，將看法和個人混為一談了。充滿多樣性的社會，不是更有趣嗎？」

Cornelia Reichel（右二）的童年一家人在一起，有一種小時候簡單的快樂（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後記

德國電影《BALLOON》講述1979年冷戰時期，東德真人真事逃亡的奇蹟，兩個家庭花兩年時間用土法煉鋼、零碎布料和有限資源自製熱氣球，首次航行失敗引來官方追查，他們爭分奪秒打造新的熱氣球，要在秘密警察追捕前升空，「在他們捉住我們之前，決不放棄。」「我們一直希望孩子們可以在自由中成長」，這樣的對白，在今時今日的社會依然意義深遠。

